

# 低谷闻高歌 曲径见坦途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世界  
社会主义思想宝库中的重要文献

黄宗良 叶自成

**内容提要** 本文阐述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对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意义。它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给予科学的回答；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体制改革作了正确的战略选择；在世界风云变幻，特别是苏东剧变的形势下指导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关键词**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世界社会主义 政治经济体制改革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总结，是指引中国社会主义继续前进的科学指南。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也包含着对其他国家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特别是近几年来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8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社会主义经历了极其重大和深刻的历史性变化，遭受了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失败。正是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这样一个转折时期，邓小平同志以一个世界社会主义的大战略家的气魄和智慧，沉着冷静地分析社会主义的世界性的难题，勇于进行大胆的探索，在实践中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从这个意义上说，《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概括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贡献。

## 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科学回答

在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什么是社会主义”是一个基本的重大的理论问题。邓小平认为我们的经验教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搞清楚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6页，以下引文均只注页码）

苏联在斯大林时期，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建成了社会主义基础，形成了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其特征是单一的公有制、无所不包的指令性计划经济、封闭的内向型经济和高度的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它一度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唯一的模式。但实际上，这一模式弊端很多，邓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第139页）后来，他又坦率地指出，中国过去照搬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为进一步科学地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提供了历史条件。邓小平同志在不断地总结中国和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此进行了新的探索，并在实践中交出了一份科学的答卷，为解决这一重大难题作出了独特

的贡献。

从整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来看，邓小平同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包括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社会主义没有统一的模式，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特色，各国的社会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小平同志多次谈到：“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第2—3页）他还指出：“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第241页）“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

（第191页）

第二，社会主义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理论观念，它应当随不断变化的现实而变化和发展。实事求是探求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同志认为，“马克思主义要发展，社会主义理论要发展，要随着人类社会实践的发展和科学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第42页）“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干中学，在实践中摸索。”（第258—259页）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在谈到中苏两党过去的争论时，邓小平同志再次深刻地指出：“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第291页）为了重新恢复实事求是这一我党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邓小平三番五次强调要特别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和思想僵化，不要固守一成不变的框框。

第三，社会主义的最基本特征就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其最本质的内容在于发展生产力，最根本的目的在于不断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

邓小平同志从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一根本问题出发，无数次地强调，“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第142页）在这看似平凡的结论中，却包含着邓小平同志的新思想和新观点。他分析了所有制过分单一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和盲目求纯的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错误，提出了发展多种经济成份的思想。他认为，社会主义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但公有制不等于国有制，国有制不能完全等同于公有制的高级形式，公有制为基础不等于全社会实行单一的公有制。私有制为主体的社会绝不会是社会主义，但个体经济、私有经济、外资都可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因此，“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第110页）

鉴于各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经验教训，针对“四人帮”“贫穷的社会主义”的谬论，邓小平同志又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他反复论证说，“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第63—64页）那么，怎

样才能消灭贫穷呢？邓小平同志不仅否定了长期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流行的“平均主义”和“干部特权”两种现象，而且大胆地提出了既要防止两极分化，又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先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提倡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是同样的道理。”（第111页）

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第63页）不仅如此，邓小平同志指出，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归根到底，要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的标准。

邓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回答，从几个方面突破了过去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框框：（1）突破了单一形式的公有制的框框，允许个体经济和私有经济发挥积极作用；（2）突破了计划经济的框框，把计划、市场作为从属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两种手段，不再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并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的理论框架；（3）突破了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允许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有利于充分调动广大群众和地方的积极性；（4）强调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突破了过去重政治轻经济、重所有制变革轻生产力发展的旧思维；（5）把实践作为衡量是非的标准，突破了过去那种在本本中争辩是非的框框，进一步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这在世界社会主义思想史上无疑具有深远的影响。

## 对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战略选择

制订改革的战略方针和政策，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大局的一门政治科学的实践艺术。比较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的过程就可以看出，中国的改革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最主要的原因有两条：一是在指导思想，即在“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上，中国逐渐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二是在改革的战略策略的选择和制订上，邓小平作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总设计师”，表现出他作为一个大政治家和大实干家的非凡的胆略、智慧，杰出的才干。在解答“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革”这一世界性的难题时，邓小平同志在指导中国改革的实践中作出了如下回答：

第一，改革作为“第二次革命”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和深入，不能完全抛弃和否定过去。

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建国以来的历史问题，尤其是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功过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在指出党和毛泽东同志建国后的重大失误时，也充分肯定了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成就，充分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邓小平同志在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会见时指出：“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不能丢掉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就是否定中国革命大部分的历史。……如何评价党的历史这个问题，我们有，你们也有。每个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只有采取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分析和总结，才有好处。……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第271—272页）对照各国改革的实践发展过程，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是多么重要。

第二，正确地选择改革的战略突破口。

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中国改革战略的基本轮廓大体是：在解决政治领导权、保证政局稳定的条件下，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后政治。正如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行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一样，中国改革的战略之一也可以称为“农村包围城市”。邓小平同志在回顾中国改革的进程时说：“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是安定的。工业的发展，商业的和其他的经济活动，不能建立在百分之八十的人口贫困的基础之上。农村改革经过实践证明是成功的。“农村改革取得成功以后，我们就转到城市。”（第117页）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的战略突破口。

中国改革战略的另一个突破口就是对外开放，即“沿海开放战略”，由沿海先进城市、地区辐射内地和农村。“总结历史经验，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第78页）对外开放的主要目标就是吸引外国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在实施对外开放战略时，中国选择了深圳、珠海、厦门等实施对外开放条件较好的地区作为“经济特区”，在短短的几年中就迅速改变了这几个特区的面貌，也起到了战略突破的作用。

第三，政治体制的改革要慎重，政局稳定是进行经济改革的基本条件。

应当说，在改革之初，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想通过政治改革来消除社会主义体制中严重的官僚主义、过分集权、法制不健全等弊端。但在政治体制改革的位置和如何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中国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战略有很大不同。

邓小平同志在指导中国改革的实践中，确定了先经济后政治，政治体制改革要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的方针。通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就可以看到一条明晰的改革的思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一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为此，要把稳定政局作为“坚定不移的原则”，改革的“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是他在改革问题上的一贯主张，对政治体制改革，就更强调“稳”。在80年代中期，当经济改革带来积极成果时，政治改革也提上了日程。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觉察到，这是一个非常困难和复杂的问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他指出：“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第176—177页）

邓小平同志认为，一方面，“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另一方面，又必须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我们能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第210页）政治体制的改革要服从于发展生产力这一总目标，必须符合三个标准：“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第213页）实践表明，邓小平同志的这个战略思想是非常有远见的。

当然，邓小平同志关于改革的战略和策略思想是极为丰富的，但结合世界社会主义改革的历史进程来看，最核心的就是正确评价过去、选择正确的战略突破口、政治改革要慎重和保持政局稳定这三条。正是这三条为中国的改革提供了正确的战略思想，使改革能够取得胜利，从而为解决如何进行改革这一世界社会主义的重大难题做出了贡献。

## 在世界风云变幻中怎样坚持和 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正确决断

1989—1991年，苏联东欧国家风云突变，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了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的最低潮时期。中国的社会主义也面临严峻考验。一方面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施加高压，企图迫使中国放弃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国内也出现了两种错误思潮。右的思潮认为中国终将步苏联东欧后尘，迟变不如早变，被迫变不如主动变；“左”的思潮认为苏联东欧巨变是由于改革而引起的，应当把反对西方和平演变放在首位。在这样严峻而复杂的历史变化面前，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应当怎样走，能不能坚持住，以什么样的方式、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成为决定中国社会主义前途与命运的关键问题。毫无疑问，中国的社会主义如果失败，那对整个世界社会主义将产生更严重的和灾难性的影响。

在这个历史发展的紧要关头，邓小平同志再次挺身而出，奋力排除各种思潮的干扰，为中国社会主义指出了一条稳住阵脚、走出低谷的正确道路，从而为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性大国中坚持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这块重要的阵地做出了贡献。

第一，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的年代，重要的是要稳住阵脚，保持国内政局稳定。

邓小平同志早在1989年2月，就很有预见地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第284—285页）1989年9月，当苏东剧变大势已难以回转时，邓小平再次指出：“国际局势还有一个方面，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动乱。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因此，首先中国自己不要乱，……唯一的办法是我们自己不乱……总之，对于国际局势，概括起来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冷静观察；第二句话，稳住阵脚；第三句话，沉着应付。不要急，也急不得。要冷静、冷静、再冷静。”（第320—321页）面对云卷浪翻的世界局势，邓小平同志大声疾呼：“中国不能再折腾，不能再动荡”，“中国不允许乱”，“中国的最高利益是稳定”，“压倒一切的是稳定”。邓小平同志在这里强调的“稳”，主要是指：一要稳定国内政局；二要沉着应付国际局势，不匆忙表态，不草率改变对外政策；三要冷静思考过去和未来，总结经验教训，立足于把中国国内的事情做好。实践证明这一方针是十分正确的。

第二，正确分析和对待苏东剧变后的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问题，为中国在世界上坚持社会主义争取一个较好的外部环境。

苏联东欧剧变后，世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变化，这为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增加了巨大的困难和压力。但是，邓小平同志认为，应具体地分析国际环境，不能笼统地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比来看问题。从此出发，邓小平同志指导我国制订了变不利为有利的处理国际问题的策略。

首先，对国际形势要继续观察。“不能看成一片漆黑，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多么严重的地步”，“世界上矛盾多得很，……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

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第354页）

其次，决不当头。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邓小平坚决表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他认为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就会失掉主动权。中国的立场应该是，谁也不怕，但谁也不得罪，按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办事。（第363页）

再次，中国不干涉苏东国家的内政。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无论苏联东欧国家怎么变化，我们都要同她们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地发展关系。这体现一位国际共运老战士对数十年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深刻理解和明智决断。

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中国既坚持了社会主义，同时又化解了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孤立、制裁的压力，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争取到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第三，正确总结苏联东欧剧变的教训，开展两条战线斗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办好中国的事情。邓小平指出，对西方的“和平演变”，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但不能把它上升为第一位，更不能搞什么经济战线上的反和平演变，因为“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第344页）。邓小平特别提醒全党，要警惕在反和平演变口号下掩盖的“左”倾思潮，并旗帜鲜明地对此进行了批驳。他指出，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第375页）。另一方面，邓小平又反复强调，反“左”也必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全盘西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第311页）

苏联东欧剧变之后，世界的社会主义的全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样的环境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更应该有新的气魄、新的胆量和新的起色。邓小平同志不仅提出了坚持社会主义、坚持改革开放总方针的思想，而且提出了加快改革步伐，使经济建设上一个新台阶的方针。早在1987年10月在与卡达尔同志会见时，邓小平同志就提出过“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的思想，后来他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一思想，指出中国要顶住西方压力，坚持社会主义，“关键就看能不能争取较快的增长速度”，“我国的经济的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发展才是硬道理”。为加快发展，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巡讲话中提出了“胆子要大一些”，不纠缠姓“社”姓“资”、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沿海地区发展要再快一些等一系列重要的战略决策。这些思想引导中国走出了1989—1991年的徘徊和停滞状态，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步入了第二个新的阶段，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在经历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的重大挫折之后，迎来了一个新的快速发展的高潮时期。

这不仅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巨大贡献，而且也是对世界社会主义的重要贡献。因为“只要中国不垮，世界上就有五分之一的人口在坚持社会主义”，“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第321、346页）

在世界社会主义由于苏联东欧国家剧变而进入低谷，前途也变得更加曲折坎坷之时，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却犹如低谷中之高歌，其声也铿，其调也昂；又如曲径之中展现坦途，其前程亦显辉煌。它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在世界上遭受了严重挫折，但并没有失败；中国的社会主义仍生机勃勃，正在继续进行探索，克服前进路上的艰难险阻，信心百倍地走向未来。

（作者单位 国际政治系 责任编辑 王毓钟）

## ABSTRACTS OF MAJOR ARTICLES

### **World Socialism and the Third volume of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by Huang Zongliang & Ye Zicheng**

This essay demonstrates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volume three of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to world socialism. The book provides a scientific answer to such a fundamental question as "what is socialism," and makes a strategic plan for the reform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At a time of disintegration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and radical change in Eastern Europe, it serves as a correct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alist construction.

### **Predictions and Analysis of Chinese People's Consumption in the Late 1990s** **by Liu Fangyu & Zhang Shaolong**

This article analyzes systematically the present consumption level and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people and predicts the possible tendency of consumption in China after 1996. Having discussed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 of consumption structure around 2000 o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y, the author proposes a consump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consumption policies for the years to come.

### **Economic Boom and Inflation-Problems Facing Chinese Economy**

**by Chen Dehua**

The Chinese economy is facing a "double high" situation, high economic growth and high inflation. The fundamental cause for high inflation i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over-heated economy and the weak basic industries and insufficient basic facilities. In order to secure a lasting, fast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the government should check the over-high speed of economic growth and control the rate of inflation to a level that society can accept.

### **Bakhtin and Social Semiotics**

**by Hu Zhuanglin**

Since the 1980s, ideologists throughout the world have been translating and studying the academic works of Mikhail Bakhtin (1895—1975), a scholar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This article aims to discuss the profound influence of Bakhtin's thoughts on modern linguistic theories, laying emphasis on his challenge against the Geneva School represented by Saussure's classic theory, and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perfection of the contemporary systemic-functional linguistics'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 this sense, it was Bakhtin who pushed forward the research of social semiotics which governs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s.

### **On the Attributes, Phenomena and Essence of Literature**

**by Zhou Wenjun & Yang Xiaojun**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different attributes of literature, including material attri-